

《殷周金文集成》簡介

趙 誠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的《殷周金文集成》第一冊已經出版，其它各冊也將在近年內陸續問世。這是我國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殷周時代鑄造的大量青銅器，由於種種原因紛紛埋入了地下。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這些埋入地下的青銅器又逐漸回到人間。許慎《說文解字》所說“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就是指重新被發現的青銅器。根據文獻記載，春秋戰國時期偶有發現，秦漢之後就常有出土。一直到了宋代，由於學者的關注和重視，纔有專門著錄銅器銘文的摹印本問世。根據幾種著錄統計，當時共收銅器約近六百件。到了清代，銅器出土愈來愈多，著錄刊印的專著也日益豐富，單是西清四鑑，就著錄了清宮所藏的二千多器。可見由宋到清這幾百年間，銅器資料的蒐集、整理，遠遠超過前代。這可以說是學術文化發展的某種反映。進入二十世紀之後，銅器銘文資料的積累隨着文化學術事業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一方面，分散在各地、分藏在各人手中未曾著錄的銅器大多有了拓本，並被分別集中了起來，而且還產生了大批的精善之拓。另一方面，由於近代工業的進步，尤其是照相技術被廣泛用來服務於印制書刊之後，出版事業有了長足的發展，這樣，被分別集中起來的銘文拓本，特別是那些精善之拓，纔得以紛紛刊著於世。所以在短短幾十年間，著錄銅器銘文的有關書刊竟然出版了一、二百種，總計著錄六七千器。銅器資料的刊布，對於銘文的傳播和探索起了很大作用。在宋代，促進了銘刻學的發展，在近代則促進了古文字學的興盛。學者們依靠這些資料，經過多年的摸索，對金文文字的構造體系以及銘文所反映的周代社會有了進一步的認識，為進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但是，由於這些刊印的書刊印數不多，流傳不廣，後來的研究者很難蒐集齊備，有的甚至很難得以一讀。有個別版本，不少研究者祇知其目而不知藏於何處，根本談不到“借而讀之”。而已經出版的一些書刊還存在不少使人為難的缺陷。如著錄中將一器分為數器，或將數器合為一器；有的將器銘蓋銘分列；有的又祇收了器銘而不錄蓋銘或祇收蓋銘而不錄器銘；有的真器偽器雜廁；有的又重復著錄；有的同一個器分別著錄後被冠以不同之器名；有的以鼎為殷，有的又以殷為鼎；有的同組之器不完全 或分散數處；有的同組之器排列不合原序；有的拓本錯亂顛倒等等。總之，情況相當複雜，也非常混亂。再從已經掌握的未曾發表的拓本來看，有的銅器銘文發表得不完全，如《兒殷》祇發表了一器；有的銘文祇發表了摹本而未發表拓本，如《內太子鼎》、《師晨鼎》等。甚至

多年來流傳於學者之間的是摹本，而原拓底本却深藏於圖書館中。還有不少精善之拓根本未曾公布於世。再從銅器查訪中得知，不少銘文被縮小了纔影印出來，以致模糊不清不便使用；有的銘文則始終未曾墨拓，當然也就沒有發表。這一些現實情況說明，非常有必要將銅器銘文的拓本集中起來，科學地加以編輯成書，以便於銅器銘文的研究再深入一步，走上更加科學的道路。《殷周金文集成》就是應這種歷史的客觀要求而編輯出版的。

編輯《殷周金文集成》是一九五六年國家製訂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發展遠景規劃時由郭沫若先生提出，具體由考古研究所承擔。在考古所裏，由陳夢家先生負責籌備。在這一段時期裏，主要進行資料準備：蒐集金文拓本，並將多年積累的金文資料加以整理。工作開展不久，發生了“文化大革命”的動亂，有關資料祇好暫時封存。不久，陳夢家先生不幸逝世，工作也就完全停頓。一九七九年考古所重新組成了編輯組，由王世民先生具體負責，經常參加工作的有陳公柔、張亞初、劉雨、曹淑琴、劉新光、王兆瑩六位先生。在廣泛收集資料的同時，對已有的金文拓片和銅器照片進行全面清理，隨着又進行編輯工作。

經過長期努力，編輯組集中了著錄銅器銘文的書刊三百多種，蒐集了已經著錄和未曾發表的銘文拓本包括重復在內總計在兩萬張以上。其中有相當一部分為名家收藏的精善之拓，如丁麟年《柘林館金文》、陳承修《猗文閣集金》、羅振玉《雪堂吉金拓本》、陳介祺《十鐘山房金石拓本》、孫壯藏器金文拓、素盦藏銅器拓本、清儀閣古器拓本、內府所藏金文全拓、叔蕃公手搨金石文字、善齋藏器全形拓以及六舟所拓的銅器銘文、潘祖蔭、劉喜海、鮑子年、胡子英等人收藏的拓本。還有一些在現在看來應當屬於稀世之珍拓。如吳大澂原藏之《宗婦鼎》拓本，上有吳親筆用篆文寫的題跋。也有的是近幾十年來根據原器（傳世品、新出土者均有）新拓之本。另外，還有七八百張流散於國外的銅器的拓本，二、三千件現藏國外的銅器資料照片，有一些未曾著錄。有了這樣一些拓本、照片，就充分地保證了《殷周金文集成》並不是簡單地將已經發表過的現存資料重新編輯成書，而是在全面佔有優質資料的基礎上，按照新的要求科學地進行編輯的金文總集。所以，在《殷周金文集成》裏所看到的某些拓本，有的原來祇發表過摹本，如《帥佳鼎》、《叔碩父鼎》等；有的原來祇發表過其中的一部分，如《梁其鐘》現在多發表了兩器，《天尹鐘》多發表了一件，《簞叔之仲子平鐘》多發表了五件；有的原來未曾發表過，如《提仲鐘》、《王子嬰次鐘》等；有的如《文物》、《考古》等刊物發表的銘文圖版，不少都曾經縮小，現在則全是原大制版。所以，可以毫不誇大地說，《集成》所提供的資料不僅在數量上比現在已經發表過的要豐富，而且在質地上也要精良得多。

在集中了資料的基礎上，編輯組又細緻地進行了「對重」、「去偽」。「對重」和「去偽」當然是要將同一銘文的各種拓本和各種著錄本集中起來，選出一精良的拓本備用，然後將重復、偽造者捨去。實際上「對重」和「去偽」的工作遠遠不止這一點。如果原來祇發表了同一器的蓋銘或器銘，就得盡可能為它們配對，如《王子午鼎》原來祇

發表了縮小的器銘，此次不僅發表原大器銘，而且配上了蓋銘。如果成組銅器有缺，就要千方百計爲其補全，那怕多補一點也好，如現藏巴黎基美博物館的那一件《梁其鐘》，此次發表的鉦間銘文即用從國外收集來的照片補齊的。如果成組銅器著錄混亂，還得多方考証該組銅器本來是幾件，排列順序如何。如《宗婦鼎》，《小校》以爲有七鼎四簋，《通考》以爲有五鼎六簋，最終尋訪到吳大澂的原藏拓本纔確定爲七器，並重新排列了順序。總之，「對重」、「去僞」是相當艱苦細緻的工作，實際上包括了尋訪、考證、查核、辨正、選擇、訂正等各方面。無異於將已經發表和即將發表的每一個拓本和照片逐一進行了審查，使收入《殷周金文集成》的每一張拓本、印本或照片，都是在現有條件下相對說來是最完整、精善、清晰、可靠的。這一點也充分地保證了該書的質量。

《殷周金文集成》全書分爲三大部分：一、銘文集；二、圖象集；三、釋文和索引。銘文集分四部分：一、正編，收器銘一萬件以上；二、附錄，與器銘有關的某些資料；三、《集成未收器目錄》，包括僞器、待酌器、部分模糊不清之器；四、補編，定稿以後的發掘品和采集品。現在出版的第一冊屬於銘文集的正編。正編所收爲一九八二年底以前的發掘品和采集品，按樂器、炊器、盛食器、酒器、水器、兵器及其它器物的次序排列。每一類器中以字數多少爲序，字少者在前，字多者在後。爲了便於翻檢、對照，正編的每一冊之前都列一詳細的目錄，包括器號、器名、字數、拓片頁碼、說明頁碼等五個項目。爲了使用者便於查核、考証、研究，每一冊之後附有《說明》和《本冊引用書目及簡稱表》。《說明》包括字數、時代、著錄、出土、流傳、現藏、拓片、備註八個部分。《簡稱表》按書名第一字的筆劃多少排列。

最近臺灣省分別出版了兩部《金文總集》，一爲嚴一萍編，一爲邱德修編。如果和《殷周金文集成》略加比較，就能清楚地發現：一、嚴、邱二書所收器銘雖然多少有別，但都是八千多器，比《集成》少二千器左右，即少五分之一左右。這是數量上的不同。二、嚴、邱二書基本上祇是簡單地將已經發表過的現存資料重新編輯成書，原來發表時是摹本、縮小本者基本沒有改變。原來存在的混亂現象仍基本保留。這是質量上和《集成》不同之處。

《殷周金文集成》由中華書局出版、上海市印刷七廠印刷。現在第一冊已經發行。預計器銘部分到一九八九年底全部出齊。《集成》器銘部分爲八開本，總計約七千面，每冊四百面左右，共約十六個分冊。圖版用一百二十克畫報紙雙面珂羅版印刷（最大限度地保證了銘文的清晰，這也是嚴、邱二書所遠遠不及的），全布面精裝，封脊“殷周金文集成”六字燙金，包以透明縐綸片，外套紙盒。本書在編輯、出版過程中，中華書局的領導相當重視。該書的責任編輯和負責影印工作的洪文濤、李聰慧等先生，爲尋訪銅器、查核拓本、校對文字、設計版面、黏貼號碼、描修去污而來往奔波，多所努力，也是此書得以順利出版的因素之一。

應該指出，校書如掃落葉，編著難免有誤，儘管考古所和中華書局的工作人員經過如此經心的一系列工作，仍然存在着個別不應該存在的毛病，如《天尹鐘》的時代，第五器註爲「春秋」，第六器却註爲「西周晚期」。同一器註成不同的兩個時代顯然有誤。

而兩個器銘的說明緊緊相連，即使是筆誤或轉抄致誤，也應於校對時發現改正，可見其實在不應該。考古所和中華書局的工作人員在樣書剛到之時就發現了這一問題。想來，類似錯誤在今後出版的各冊中將可能不再發現。